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

□ 石仲泉

[中图分类号 J849.1

[文献标识码 J

[文章编号 J1006-6470(2002)01-0004-05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了。10年来，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方谈话”对于我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来纪念“南方谈话”，更能清楚地认识它的历史地位。

一、“南方谈话”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南方谈话”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的发展处于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之际发表的。当时，国内外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东欧“易帜”后，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在国内政治风波发生后，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在国内政治风波发生后，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议论和倾向，使不少人感到困惑。今后的路怎么走？再一次提到党和人民面前，需要作出明确的抉择。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严峻考验。

邓小平尽管已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但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仍无时无刻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不顾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

——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他谆谆教导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

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同时，他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对于中国今后走怎样的道路，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对于是否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他斩钉截铁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我们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不要使人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对于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作了进一步说明。这就是“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他展望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

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这些铿锵有力的讲话,犹如霹雳雷鸣,顿时冲散天空出现的阴霾。它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坚定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只能认准一条: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只有这条路能够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南方谈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进入新世纪的当今中国的唯一出路。

二、“南方谈话”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思想解放的历程。我们党坚持以思想解放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这些年来,每当国家的发展处于重要历史时刻,就要经历一次极具震撼力的思想解放的高潮。

早在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们国家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断送。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我们国家在进入新时期经历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大潮,那么“南方谈话”的发表,则是新时期经历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大潮。那时人们的疑虑、困惑,除了在要不要坚持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路线之外,还表现在对改革的姓“资”姓“社”方向、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关系、以及政治倾向的“左”与右等问题上。“南方谈话”对这些重要问题同样作出了明确回答。

——关于改革的姓“资”姓“社”方向。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问题。他列举“三资”企业和经济特区的情况说:办

“三资”企业,外商要赚一些钱。但国家要拿回税收,工人要拿回工资,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得到信息,打开市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对办特区,他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性’社’不姓’资’”。

——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关系。邓小平进行了10多年的长期思考和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关于政治倾向的“左”与右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南方谈话”对上述这类问题的回答,改变了长期束缚人们的许多陈旧观念,消除困惑,与时俱进,精神上获得又一次大解放,从而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之深刻程度,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有切身感受。就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发生的影响看,这一次思想解放的震撼力如同前一次真理标准讨论那样巨大。那一次思想解放产生的能量,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能量之一,是使此后的历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历史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南方谈话”的思想解放精神,对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着巨大影响。江泽民高度评价“南方谈话”的思想解放作用。他在“南方谈话”发表后不久指出:思想解放了,脑筋

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更广阔。“因此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历史发展正是这样。10年来，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在“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影响之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跨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都在它的光焰的照耀之下。

这里，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根据“南方谈话”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解放精神，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在党的十四大不仅初步地建构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要求、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等进行阐述，使之初具理论轮廓。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and 许多政策规范。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上建立起来。党的十五大继续以“南方谈话”为指导来分析形势、制定政策和提出任务。十五大在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新的阐发，并正式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还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方式和市场经济机制作了新的表述，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新的界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些新的决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过去的一些固定观念。这样，在“南方谈话”的指引下，经过十四大和十五大，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初步解决了。这是1978年以来两次思想解放的丰硕成果。

二是江泽民在2000年春天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向全党推出认识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在“七一讲话”中，又对“三个代表”思想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发，其科学内涵、立论依据、基本要求、体现途径，以及相互关系等更加明确起来，从而初步地具有科学的理论形态。当然，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还没有完结。但是，经过“七一讲话”；“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理论形态已经建构起来。这样，经过理论阐发的“三个代表”思想就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不仅如此，“三个代表”思想所体现

的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紧跟时代的创新意识和锐意改革的坚定信念，以及振兴中华的奋斗精神，还具有思想方法论的普遍意义。“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表明新一轮思想解放大潮已扑面而来。

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已初步解决，“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则是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又一个根本问题。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回答的意义一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回答，也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七一讲话”是思想解放的又一个宣言书。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七一讲话”提出了深化三个方面思想解放的任务。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七一讲话”号召全党，坚持科学态度，大胆探索，使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三个代表”思想的伟大历史作用，还不仅仅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新思路。因为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既要求改变过去与此不相适应的那些政策和规定，还要求深化对党自身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沿着这个理论的思路和历史的逻辑走下去，就势必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开辟出新路，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新的契机和动力。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提出的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决策，以期“通过发扬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有助于开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

三、“南方谈话”是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伟大创新的重要标志

恩格斯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

论。这是一种怎样的发展呢？只是原本理论的扩展、充实、深化、个别理论观点的创新，还是包括着理论形态的巨大变化？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怎么认识的问题。

按照老祖宗们的辩证法讲，任何事物都包含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既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这样理解。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的东西，只具有普遍性而不存在特殊性。如果这样，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这个系列的任何被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应具有的共性内容：如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剩余价值论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承认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成功后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消灭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通过改革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长，使传统观念得到根本改造，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未来的社会大体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长期发展过程，等等。在马恩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属于他们“个性”特质形态的东西：如主要依靠无产阶级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统一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消灭了商品和货币，各尽所能、通过劳动券按劳分配，等等。当然，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性的那些内容从来没有单独孤立地存在过，最初也很难将两者加以区别，何况随着历史发展也会发生转化。这是纯理论的抽象分析。因此，马恩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没有也不可能作这样的具体解剖。属于共性的那些内容，与实际上属于马恩特质的那些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它寓于带有马恩特质的理论形态之中。科学研究的作用，就是要拿起辩证法这把解剖刀，对它进行理论的解析。

列宁基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出发，改变属于马恩特质理论形态中的社会主义在主

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观点。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又为提出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建成的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为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指出了方向。他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建设理论，并提出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上，将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强化了计划经济；在生产资料领域实行产品调拨，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承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在发展战略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等等。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等等。显然，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既是对马恩特质理论形态的重要发展，也有一些重要变化。但它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认识没有突破马恩的特质理论形态。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对后来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消极影响。

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作了巨大贡献。他领导中国革命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特殊途径。他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强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在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对外关系、国家安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与政策。这些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对马列特质理论形态的重要发展，但也未能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取得根本突破。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失误，虽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害，但也深深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就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特别是通过“南方谈话”，他

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建国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以及苏联、东欧建设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正反经验的总结,提出和深化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比较完备的形态;并且建构起了既是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性的,又同以往几个理论形态有重大区别的新社会主义观。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主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其他像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等等,都给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了新质规定。就其理论形态的特殊性言,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是一个区别于老祖宗们那种观念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形成了同具有马恩特质的理论形态很不一样的又一个理论形态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为什么能构成一个大的新阶段呢?归根结底,还是列宁说的: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恩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更多地是基于他们所创立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的推论。他们那时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的理论认识是否正确,要由社会主义的实践来判别。所以,他们自己也只把那些认识视为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从不认为是现成的模式。他们的有的观点,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有的认识,则由实践作了修正。列宁主义的发展,就是对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部分修正。但是,列宁过早地逝世了,经历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比较短。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对在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带有极大的开拓性。既然如此,那就会有成功的经验,也会有不成功的教训。这些都是后来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宝贵财富。正因为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作先导,有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积累,邓小平理论就具备了能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理论形

态的历史条件。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对于毛泽东,既不能脱离历史条件予以苛求,也不能将历史没有提出的任务提前赋予。事实上,毛泽东没能实现的夙愿,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成了。如果把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作为这个理论的前期积累,那么也可以说,它是“始于毛,成于邓”。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理论形态,也包含了毛泽东的贡献。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七一讲话”的一个伟大贡献在于,庄严地履行了这个历史责任。它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面对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变化,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成员的变化,面对党的地位、环境和任务的变化,提出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许多新观点。如:关于判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主要标准、关于判断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成员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主要标准、关于吸收社会各方面优秀分子入党的主要标准、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政治称谓、关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等。这里的许多看法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初步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南方谈话”是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伟大创新的重要标志。它的光辉必将照耀中国共产党人去继续攀登目前正在攀登的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 [1]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
- [2] 列宁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版.38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337-338.

责任编辑:郑红霞